

增加农民收入与扩大农村消费研究^{*}

□方松海 王为农 黄汉权

摘要:当前我国农村居民收入持续增长,消费总量提高、结构优化,消费倾向高于城镇居民等特征突出,而城乡、地区、人群差距拉大以及消费贡献率下降等问题明显。教育费用、基础设施和信贷约束三大因素既制约农民增收,也限制农村消费扩张。同时,农民增收面临着外部环境变化的考验,农村消费也受到农村社会保障和人口结构问题的间接制约。“十二五”期间增加农民收入与扩大农村消费的着眼点在于实现全面小康和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实现农村居民收入较大幅度增长是进一步增强其消费能力的根本着力点,为此建议:实施教育、金融和基础设施三大差别化支持方案,重点提升中西部落后地区,中低收入群体收入能力和消费能力;推动农民收入倍增计划,构建有利于农民的农业产业链模式,营造有利于现代农业和中小微型企业发展的环境;促进农村居民生活现代化,加快发展农村社会事业,改善农村消费环境等。

关键词:农村消费 差别化支持方案 收入倍增计划

“十二五”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承前启后的关键时期。在这个时期继续保持农民^①收入较快增长、农村消费^②持续扩张,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战略举措。本研究着眼于探讨在“十二五”这个关键时期,如何通过提高农村居民的收入能力和消费能力,以更好提升其生活水平,提高其在国民经济增长中的收益分配比重和消费贡献率,更好地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全面小康。

一、增加农民收入与扩大农村消费相关理论探讨

收入和消费^③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是不可分割的整体。收入水平是消费决策的约束条件,几乎所有研究都表明,消费与收入高度正相关,即收入水平越高,消费水平越高;从广义上讲,消费是收入的目的,不管是投资还是储蓄,其目的最终还是落脚于消费,只不过是现在消费和未来消费的差别而已。消费应该包括3个要素:消费能力、消费倾向和消费结构。从消费的视角来看,可支配收入水平基本上就是消费能力的代名词。由于涉及面太广,理论梳理也不可能面面俱到,只能把有限的分析集中于制约农村居民收入和消费增长的若干关键问题上。

(一)农民收入和农村消费现有相关研究成果分析

1.关于农民收入。增加收入是扩大消费的基本前提,已有分析表明,制度性障碍、人力资本不足等因素是影响农民增收的主要原因。(1)城乡二元结构、农地制度和金融制度等制度性障碍是制约农民增收的根源。城乡二元分割体制的障碍首当其冲(陈锡文,2002;黄祖辉、王敏,2002;黄少安,2003;蔡昉、王德文,2005;孙继辉,2004),其次是现行农地制度(黄季焜,

^{*}本文是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2009年重点课题“‘十二五’期间增加农民收入与扩大农村消费对策研究”课题组的集体成果。课题负责人:方松海、王为农,执笔人:方松海、王为农、黄汉权。课题组其他成员如国家发改委产业所的姜长云、刘中显、涂圣伟、蓝海涛,中国人民大学的杨帆、赵淑芳,南京农业大学的张晓敏等也都做出了不同程度的贡献。还有许多人在本课题的研究过程中,贡献了许多精力和智慧,在此无法一一具名,只能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2000)^④。此外,金融制度对农民增收也有关键影响,中国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增长具有显著的负效应,直接导致城乡收入差别拉大与二元结构的强化(温涛等,2005)。(2)农民人力资本是影响农民收入的重要原因(柯炳生,2005),人力资本的差距也是造成农村地区之间、农户之间和农民个人之间收入差距的“最持久的源泉”(Brandt et al.,2000)^⑤。此外,农业产业结构、农产品价格较大程度地制约了农业经营收入。对于城乡二元体制问题,目前正在有序推进,方向很清晰,关键是执行的力度和进度^⑥。

2.关于农村消费。现有研究认为收入水平低(戎刚,1997;社科院课题组,1999a)、分配差距大(孙江明、钟甫宁,2000;吕耀、王兆阳,2001;王秀杰,2002)^⑦等是制约农村居民消费的主要因素。此外,家庭人口年龄结构、农民文化信念和习俗、文化素质、农村人口城镇化等也成为了制约农村消费的若干原因。其中:(1)收入水平、分配差距和不确定性作为影响农村消费水平的三大原因符合逻辑。这是直接从新古典消费理论推导出来的3个主要结论,反映了影响消费决策3个层面的因素。农村居民收入水平是其消费决策的预算约束,收入的高低直接决定消费能力的高低;国民收入分配形成的城乡、群体间的差距影响宏观层面的平均消费率,它通过微观个体边际消费倾向递减的特征影响整体的消费率水平;不确定性问题(樊潇彦等,2007;孙文凯、白重恩,2008;杭斌,2001;孙凤,2001;汪红驹、张慧莲,2002;王芳,2006;杜海韬、邓翔,2005)更多表现于微观领域,它通过改变微观个体对未来的预期改变储蓄、投资倾向从而影响当期消费,在宏观领域,微观个体的风险态度并不会改变宏观格局^⑧,能够因不确定性影响宏观消费率的多是制度、文化等全局性因素而形成的不确定性。(2)流动性约束、消费环境如何影响消费需进一步讨论。流动性约束的结果是微观个体无法平滑各期消费。现有研究揭示的问题都是正规金融缺位于农村消费领域(刘建国,1999;汪红驹、张慧莲,2002;万广华、张茵、牛建高,2001;万广华、史清华、汤树梅,2003;裴春霞、孙世重,2004;朱信凯,2005;臧旭恒、裴春霞,2007;刘金全、邵欣炜,2004;杜海韬、邓翔,2005;高梦滔等,2008),但这个“约束”未必是真约束。在很多情况下,农村内部形成的社会资本对农民生活的消费平滑起到了重要的支撑作用,没有足

够的证据表明农村的非正规融资渠道无法弥补正规金融在消费信贷上的缺位。消费环境问题(刘建国,1999;林毅夫,2003;胡雪萍,2003;社科院课题组,1999a等)对消费的影响可能更多体现在消费质量、消费结构以及消费者效用等方面。(3)文化素质、城镇化、年龄结构、习俗等问题^⑨可能与扩大农村消费没有直接关系。文化素质、城镇化等因素更多地与收入水平或收入预期直接相关,从而间接地对消费起作用^⑩,据此认为文化素质和城镇化会影响消费行为没有说服力;至于家庭年龄结构、文化习俗等因素对消费的影响最多也是体现在对效用评价体系的改变,由此出发考虑如何扩大农村消费没有太多实际价值,因为并非对所有市场主体来说,消费率越高越好^⑪。

鉴于研究的落脚点在于农村消费问题,而且对于农民增收问题的理论判断多有共识,所以在进一步的理论分析中,消费相关理论问题将作为主要切入点。

(二)对现有理论的一些修正和补充

现有消费理论分析框架与政策分析实际需要还有一定距离,笔者尝试从政策分析的需要出发调整消费理论分析框架。立足于莫迪利安尼(1954)^⑫和弗里德曼(Friedman,1957)的跨期消费理论基础,根据中国农村居民消费的主要特征和政策分析的特殊性,我们以效用函数为基础构建了简明的农村家庭两时期消费模型^⑬。模型主要分析结果如下:

$$C^* = \frac{\bar{Y}}{1 + \frac{\rho}{\theta}(\alpha\eta_e + \beta\eta_z + \gamma)} \quad (1)$$

(1)式表明:当前可支配资金量和消费率共同决定消费总水平;消费率的高低是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对当前消费和未来消费的评价系数(θ 和 ρ)、各种投资的实际产出弹性(如教育投资产生的能力增量 η_e ,生产投资产生的产品增量 η_z)以及各类投资方式对整体预期收益的贡献系数(α 、 β 和 γ)都会对现期的最优消费决策(C^*)产生直接影响。农户作为生产、消费的复合体,其消费决策行为还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农业生产的技术水平或投资的回报预期越高,对当期的消费率越会产生挤压作用。所以,一般来说,农村生产经营技术越好的家庭,越愿意在生产上进行更多投资,从而越节俭。第二,生产资料价格(P_z)

上涨、教育费用(p_e)上涨和消费品价格(P_x)上涨一样,都会对当期消费产生挤压,从而影响实际消费量(X),降低家庭福利。因为对约束条件引入价格变量后,有: $X=(\bar{Y}-p_e e-P_z Z-i)/P_x$ 。

综合模型分析结果,主要结论除经典的共识(影响消费总水平的决定变量是当前可支配资金量)之外,以下几点值得注意。

第一,预期投资回报率越大,用于现在的消费支出越小。农户对生产投资回报率的乐观预期会促进增加投资、减少当期消费,生产形势越好越有利于增加投资,越不利于扩大消费。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农业生产的技术水平或人力资本投资回报预期越高,当期的消费率越低^⑨,但对家庭总体效用不一定产生直接影响;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涨、教育费用上涨,会挤压当期消费,从而影响实际消费量,降低家庭效用水平。

第二,未来消费的边际效用评价越高,当期消费比重越小。对未来人口抚养比例增加的预期(如老龄化)会通过增加未来消费的效用评价挤压当期消费。

第三,生产不确定性和生活不确定性对消费决策的影响大不相同。生产的不确定性越强(如市场风险),投资越谨慎(用于当期消费的比重会更大),而未来生活的不确定性越强(如社会保障缺失),当期消费越谨慎。相应地,生产类的保险(如农业保险)政策有助于扩大投资,生活类的保障政策(如合作医疗)有助于扩大消费。

第四,通货膨胀预期会增加现期消费,相反,对未来通货紧缩的判断会减少现期消费。CPI上涨反而对促进当期消费有利,因为如果形成了对未来通货膨胀的预期,居民反而会增加当期消费。但该因素的影响只是阶段性的,一旦预期发生改变,消费行为也会随之发生改变。

第五,农村基础设施、农村市场现期消费品价格水平影响消费结构

和效用水平。一旦消费环境发生改变,对同一物品的效用评价也会发生改变。一个地方不通自来水,洗衣机对消费者用处不大,一旦供水、供电得到保障,洗衣机的作用才会得到有效发挥。一个地区的消费能力能否被激发出来,与供给是否匹配密切相关。这种匹配既包括与需求欲望的匹配,也包括与当地实际消费能力、实际环境的匹配。与购买过程相关的基础设施,则通过产品的价格体系得到反映。交通越不方便,购买商品的交易成本越高,商品购买的实际支付越高。这两种关系反映在消费结构、消费质量上,并对整体福利的变化产生影响^⑩。

从微观主体的角度看,投资和消费并没有根本区别,问题的本质只在于是选择让现在消费多一些还是让未来消费多一些。当前消费率的形成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而且很可能是在现有约束条件下自然形成的一种均衡。如果想根本改变均衡,必须有足够的力量改变约束条件,否则任何拉动消费的短期政策只能产生短期的效果。对农村居民而言,这些约束条件包括收入能力、生产生活风险的保障、关键性支出的压力(如医疗)以及国民经济中劳动要素(如劳动工资)及农业生产活动在收入分配中的格局(如农产品价格)等。

梳理收入、消费理论与政策实践背后纷繁复杂的逻辑结构,简要概括如下:农业生产、农民生活以及收入分配将分别从微观和宏观影响消费倾向;消费环境、消费补贴政策将会通过消费成本和价格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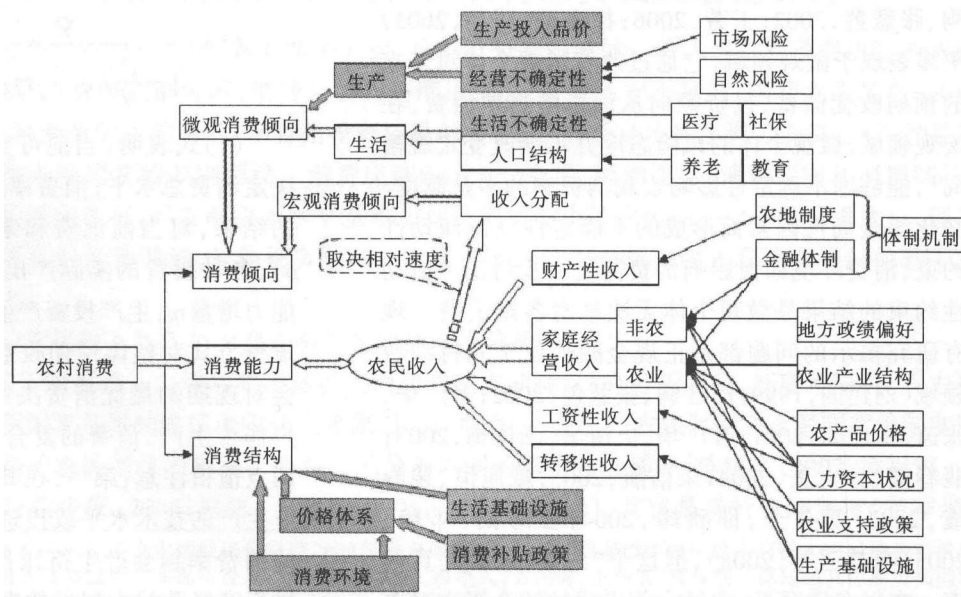


图1 增加农民收入与扩大农村消费因素分析归纳
注:颜色加深部分为本研究新补充或修正的内容。

系的改变影响消费结构;增强农民消费能力、提高收入需多管齐下(见图1)。

二、我国农村居民收入与消费现状

“十一五”期间,我国农村居民收入与消费总量提高、消费结构优化、消费倾向高于城镇居民等特征突出,而城乡、地区、人群差距拉大以及消费贡献率下降等问题明显。

(一)主要特征

1.农村居民收入与消费水平同步提高。进入新世纪以来,取消农业税、提高粮食最低收购价、增加农业补贴、扩大农民就业等惠农政策连续出台,有力促进了农民增收。按可比价计算,2001~2008年,我国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6.7%^⑨,2008年达到4761元。随着收入水平提高,消费支出快速增长。2008年,全国农村居民消费总量为26906亿元,比2001年增加了11240亿元,年均增长8%;从人均消费水平看,2008年为3661元,比2001年增加了1920元,年均增长5.7%^⑩。“十一五”期间农村居民收入和消费增长速度明显加快。按当年价计算,“十一五”前3年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13.5%,人均消费支出年均增长12.7%,远快于“十五”全期平均增速(分别为7.6%和8.9%)。农村居民消费支出与收入增长保持了良好的同步性(见图2),而且富于收入弹性,1993~2008年15年间实际消费对实际收入的弹性系数平均约为1.18,即农民收入每增加1%,农民实际消费增加1.18%。增加农民收入对扩大农村消费具有根本性作用。

2.农村居民消费结构逐渐优化。随着收入水平提高,农村居民消费状况不断改善。2008年农村居民消费的恩格尔系数为43.7%^⑪,比2001年降低了4个百分点。食品消费中粮食类消费明显减少,对肉禽蛋奶食品、加工性食品、保健食品的消费快速增加;衣着类消费支出在绝对数增加的同时,占总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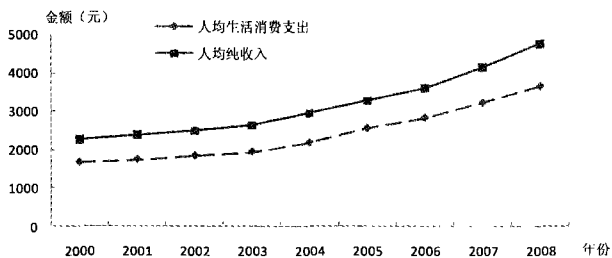


图2 农村居民收入—消费水平变动趋势图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9》整理。

出的比重基本稳定;随着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条件的改善,交通通讯支出所占比重7年内提高了3.5个百分点;文教娱乐用品及服务消费支出2005年比重达到最高点11.6%,2008年回落到8.6%,2005年之前的增长与教育的市场化改革有关,之后的回落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义务教育改革。出于改善居住条件需要,农村居民居住支出明显增加,带动家庭设备用品和服务支出所占比重的提高^⑫。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年农民的医疗保健支出持续增长,2008年医疗保健支出所占比重比2001年上升1.2个百分点(见表1)。

3.农村居民消费倾向高于城镇居民。农村居民的消费率^⑬在2005年发生了较大变化,平均消费率从2004年的0.74增加到0.79,随后逐渐回落。相应地,2004年到2006年的边际消费倾向也经历了从0.77到1.16再到0.82的变化^⑭。相比而言,城镇居民的消费倾向变化比较稳定,从2002年平均消费率开始一直稳步下降。2002年以后,农村居民边际消费倾向高于城镇居民;2004年以后,农村居民的平均消费率也高于城镇居民(见图3)。

4.地区和人群间的消费倾向有所不同。从区域看,农村居民消费不管是平均倾向还是边际倾向,西部地区最高,中部、东北地区其次,东部地区最低。

表1 农村居民家庭平均每人生活消费支出构成

支出项目	2001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1~2008年 权重变化率%
生活消费总支出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
食品	47.7	47.2	45.5	43.0	43.1	43.7	-8.3
衣着	5.7	5.5	5.8	5.9	6.0	5.8	1.8
居住	16.0	14.8	14.5	16.6	17.8	18.5	15.6
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	4.4	4.1	4.4	4.5	4.6	4.8	9.1
交通通讯	6.3	8.8	9.6	10.2	10.2	9.8	55.6
文教娱乐用品及服务	11.1	11.3	11.6	10.8	9.5	8.6	-22.5
医疗保健	5.5	6.0	6.6	6.8	6.5	6.7	21.8
其他商品及服务	3.2	2.2	2.1	2.2	2.3	2.1	-34.4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9》、《中国统计摘要2008》整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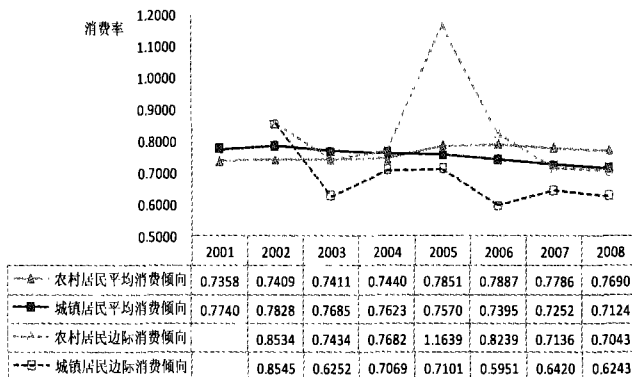


图3 城乡居民消费倾向变化(2001~2008年)

资料来源: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数据整理。

2008年,西部、中部、东北和东部4个地区平均消费倾向依次0.82、0.76、0.72和0.71,边际消费倾向依次为0.74、0.71、0.68和0.60。按收入水平划分,低收入家庭同样比高收入家庭具有更高的消费倾向。按五等分划分,由低收入户到高收入户,同年平均消费倾向依次为1.43、0.90、0.78、0.71和0.61,边际消费倾向依次为1.92、0.84、0.64、0.64和0.57。增强中西部地区、中低收入人群的消费能力,应是“十二五”期间扩大农村消费政策的主要着力点。

(二) 主要问题

1. 农村居民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份额持续下降,消费贡献率也在下降。相比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我国农村居民收入和消费增长偏慢,农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分配比重、农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偏低,“十五”以来下降明显^②。2008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全国人均国民收入(GNI, 22804.9元)的20.9%,比2001年下降7个百分点,年均减少1个百分点。2002年农村居民消费占国民经济最终使用总额(TFU)比重为11.0%,2007年下降为7.2%,减少3.8个百分点,在各项消费支出中下降幅度最大(见表2)。从2001年到2008年,农村居民消费支出总额占全部居民消费支出比重由31.8%下降到24.8%,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由14.4%下降到8.8%^③,农村居民消费支出在全体居民消费中的增量贡献率由25.8%下降到22.7%,分别减少6.8、5.6和3.1个百分点。

2. 城乡收入和消费差距明显。虽然政府采取了种种措施,力图通过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拉动农村,统筹城乡发展,形成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格局。但是城乡居民收入、消费差距的缩小无法一蹴而就,甚至还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2002年以来,城乡居民的收入比、消费比一直保持在3:1以上,收入差距持续扩大,而消费差距在2003年达到峰值(3.35)之后逐渐回落,2004年以后收入差距超过消费差距,而且距离逐渐扩大(见图4)。与城市居民

相比,农村居民整体购买力弱、消费水平较低,城乡之间约有10年的差距^④,有的地区甚至更长。

3. 地区及群体内部差距问题突出。2008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东部地区是西部地区的1.88倍,生活消费支出为1.67倍。在课题组调研的几个地区^⑤,这种特征更加突出。2008年福建省晋江市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是甘肃省礼县的5倍,农民人均生活消费约为4倍。从农民内部差距看,按收入五等分划分,2008年农民人均纯收入高收入户是低收入户的7.53倍,生活消费支出是3.20倍。各地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导致不同地区农村居民消费能力、消费结构等方面存在巨大差异。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电脑、汽车等高端消费品已经进入农民家庭,普及率较高。在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地区,农民的消费仍处于生存型消费阶段,不仅高档消费品的拥有量非常少,部分常规耐用消费品的普及率也比较低。在部分地区、部分群体已经跨越小康进入富裕阶段的同时,还有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低收入群体尚处于温饱阶段,实现全面小康任重道远。

4. 农村消费价格涨速较快。在收入水平提高不快的情况下,农村居民对消费品价格的敏感度大于城镇居民。这些年,农村居民消费价格上涨幅度超过城镇。2001~2008年城乡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平均每年上涨2.4%,其中城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上涨2.1%,而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上涨幅度达2.8%。从商品零售价格指数看,同期全国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年均增长1.5%,其中城镇仅为1.2%,农村高达2.2%。需要指出的是,农村居民的平均收入水平只有城镇的30.2%。农村消费价格的过快上涨,必然削弱农民的实际购买力,降低其实际需

表2 农村居民消费支出在国民经济投入产出中份额的变化(万亿元)

年份	项目	最终消费支出				资本形成总额 GCF	出口 EX	最终使用合计 TFU
		农村居民 消费支出 FU101	城镇居民 消费支出 FU102	政府消费 支出 FU103	消费合计 TC			
2007	额度	2.43	7.22	3.52	13.17	11.09	9.55	33.82
	结构	7.19%	21.35%	10.41%	38.94%	32.79%	28.24%	100.00%
2002	额度	1.63	3.63	1.91	7.17	4.56	3.09	14.82
	结构	11.00%	24.49%	12.89%	48.38%	30.77%	20.85%	100.00%
结构变化		-3.81%	-3.15%	-2.48%	-9.44%	2.02%	7.39%	

数据来源:根据《2007年中国投入产出表》、《2002年中国投入产出表》整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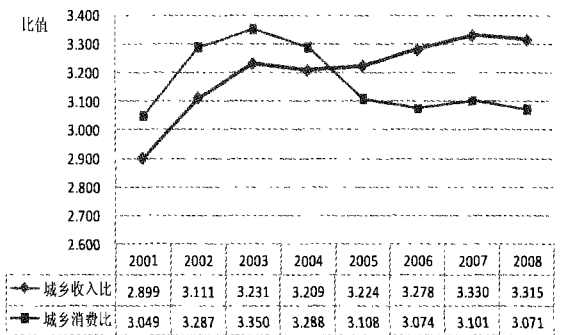


图4 城乡居民收入、消费比较(2001~2008年)

注:城乡收入比=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
城乡消费比=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2~2009历年住户资料整理。

求。这个问题与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农村市场体系建设和治理直接相关。

从当前农民收入和消费的特征和问题来看,农民收入增长促进了农村消费的增长,但农民收入和消费的增长速度慢于国民经济增长速度,慢于城镇居民增长速度,以至于城乡差距持续拉大、在国民经济分配中的份额持续下降。所以,增加农民收入以提高消费能力,在确保较快提高其消费能力的基础上激发消费潜力是“十二五”期间扩大农村消费的核心。

三、制约我国农村居民收入与消费较快增长的主要因素

影响农民增收和扩大消费的因素归纳起来有三类,一类同时影响收入和消费增长,一类主要影响增收^①,一类主要影响消费^②扩张。

(一)三大因素制约农民增收,也限制农村消费扩张

从调查情况看,直接制约农民增收的主要问题各地有所不同。较发达地区^③反映突出的是如何提升农民素质、促进创业等;中等发展程度的地区^④集中反映的是如何提升农业效益、生产贷款难等问题;欠发达地区^⑤最突出的问题是交通基础设施严重滞后,有些村庄迄今路都还没通,许多好产品根本无法卖出好价钱。区域发展的差距主要是农村发展的差距,农村发展的差距在于基础设施的差距、资金要素的差距和劳动者发展机会的差距。这些问题同时又与农村消费密切相关。

1.文化素质偏低已成农民增收瓶颈,过高的教育费用既挤压当期消费又制约收入能力提升。我国农民文化程度普遍在初中以下^⑥,农民文化水平整体较低,这一方面造成农民难以有效接受新信息、新技术、新方法,另一方面直接影响了外出务工人员的就业选择和收入水平^⑦。尤其当农村青年劳动力大量外出务工时,留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素质问题更加突出^⑧。

同时,教育成本尤其是高中以上教育成本过高,成为许多农村家庭的主要负担。这既挤占了这些家庭的当期消费能力和欲望,也对农村人力资本投资产生了不利影响。在全国13省(市)的样本家庭中,有孩子正接受高中及以上教育的家庭平均教育支出9213元,占农民家庭生活消费总支出的一半

以上。对江西三县(市)调查发现,有孩子正接受高中及以上教育的农民家庭平均教育支出达12718元,占家庭年均纯收入的49%。甘肃省礼县农户问卷调查显示,有一个孩子在上高中、大学(包括大专)的家庭,平均一年教育支出需要增加8000元左右,相当于当地一个普通农民5年的纯收入(按2008年)。庞大的教育支出对年收入大部分在2万元以下的普通农村居民家庭,无疑构成了一种沉重的负担。调研时许多农民表示“学费太贵,家庭很难承受”。加上义务教育阶段因资源配置问题导致的额外负担^⑨,许多日益优质的教育资源,贫困家庭的子女根本无力享受,本来可以通过人力资本投资得以改变的差距却因人力资本投资能力的差距而日益拉大。礼县文家村村民反映,由于上大学成本太高,很多家庭的孩子都上不起,只好外出打工。对大多数农村父母而言,他们都希望子女能“成龙成凤”、“跳出农门”,对子女成才的期待很高。在自身收入无力承受的情况下,不少农村家庭不惜举债供子女上学。在全国样本154个有孩子在上学的家庭中,因孩子上学向亲戚朋友借钱或银行贷款的有46户^⑩,占30%,平均每个家庭借款达9363元。还有20%认为孩子现在年级比较低暂时不用借钱,但升学后就需要借款,二者合计50%。人力资本投资的高门槛对提高贫困家庭未来的收入能力和提高当前生活水平产生了显著的双向制约^⑪。

2.农村基础设施普遍滞后,既构成增收瓶颈又制约着农民消费。基础设施不足的问题在农村地区普遍存在,在落后地区尤其是中西部落后地区尤为突出。(1)农田水利问题久悬未决^⑫。迄今为止,仍有部分地区没有走出“靠天吃饭”的境况。例如,地处偏僻的甘肃省礼县,地下水资源不足,一些村庄连人畜饮用水都只能靠水窖收集雨水,更谈不上农业灌溉。全县大部分水利工程都修建于20世纪70年代,目前完好率还不到30%,全县2个水库都不具备灌溉功能,能旱涝保收的耕地只有5%,严重制约了当地农民的增产增收。这种农田水利年久失修的情况并非特例,在课题组这两年调查过的江苏省建湖县、福建省云霄县、安徽省怀远县、黑龙江省青冈县等地,水利问题同样突出。(2)国家“村村通”工程虽然显著改善农村道路状况,但与实际需求相比还显不足,特别是一些经济欠发达地区,依然处于“晴通雨阻”状态。此外,树状结构路网形成

的“断头路”问题在几个调查点都有反映。道路不好,让一些偏僻地区的好产品难以卖出好价格,制约了这些地区农村居民的发展机会,也抑制了对交通工具的需求。(3)农村用电困难的问题依然明显。一些地方农网改造后的农村变压器容量普遍偏小、线路设施标准偏低、电压不稳,特别影响电器使用寿命,难以适应农村生活水平提高对用电迅速增长的需求。而且全国用不上电的还有几百万农户。(4)农村居民生活用水仍面临困难。2001~2008年我国已累计解决农村1.79亿人的安全饮水问题,还有2亿多人饮水不安全^⑧,其中大部分人饮用水有害物质超标。不少地区的农村不通自来水,甚至连日常生活饮水也成问题,更无法使用洗衣机等现代电器。(5)农村信息化进程滞后,有线电视网络、互联网覆盖率低。这既制约农村家庭购买电视、电脑,也因为基础设施的差异拉大了城乡、地区间信息的鸿沟。(6)农村市场建设明显滞后,既不利于本地农产品商品化,也不利于外部的生产资料、消费资料和农业科技的输入,在一定程度上既制约了收入也抑制了消费。而在另一个层面,农村基础设施的以上问题都直接增加了农村居民消费成本,降低了消费质量。

3.农村信贷约束,既加大农村居民增收难度也限制了消费平滑。农村储蓄资金向非农业、非农村方面流失,农村生产发展面临的信贷约束成为当前农村发展一大障碍,这已成共识。具体表现为:(1)金融机构农村网点过度裁撤,金融支农服务急剧萎缩。截至2009年6月底,全国约1/3的乡镇仅有一个甚至没有金融机构或银行网点^⑨。曾经是农村金融主力军的农业银行,2009年底全国网点不足2.4万家,与1998年相比减少约60%,缩减的绝大部分是农村基层营业网点。据我们调查,从1998年到2009年,福建省晋江市、云霄县、黑龙江省青冈县、甘肃礼县农行所有乡镇网点全部撤销,有的全县只有农行一家商业银行。现在农村信用社是农民贷款的主渠道,但由于资金来源受到歧视性政策的制约^⑩,农村信用社吸收存款数额小,支农力度难以扩大。(2)农民贷款难、利息高、额度小。一方面,缺乏有效的抵押担保,农民难以获得贷款。福建省云霄县某村少数村民得到了农村信用社提供的贷款,但拿不到全款,1万元的贷款额实际只给9000元,而且利息太高,一个季度1万元的利息就达230多

元。另一方面,信用社审批贷款的权限上收,农民贷款的审批更为困难。甘肃省礼县农民贷款5万元以上就需要上报,县信用社自己没有决定权,审批起来很麻烦。(3)贷款五级分类的标准不适于农户实际信用评价。按照现行贷款五级分类标准,不仅工作难度大,而且在贷款质量真实性方面的反映也较容易存在偏差。五级分类要求,贷款必须按期结息,如二期未按时清息^⑪,此笔贷款则被归为不良贷款。由于农业本身具有高风险、周期长、收益低的特点,农民收入很不稳定,到期偿债具有不确定性,因暂时没钱或者在外打工而未按时还款的事情常有发生,并不是农民故意赖账不还。但是按照五级分类要求,其贷款就会被归为不良贷款。这一方面打击了信贷员发放小额农贷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导致这些农民今后贷款更加困难。信贷的约束增加了农民扩大生产的难度,同时也使得农民无法根据其收入季节性的特点平滑消费,有时还不得不以增加储蓄应对收入的波动,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当期消费率。比如改善居住条件,农村居民一般需要依靠家庭多年的积蓄或通过亲戚朋友多方筹措,通过银行贷款提前支付几乎不可能。

以上是制约农村发展、制约农民收入和消费水平提高的3个根本问题。这三大问题本质上反映了农村发展三要素的先天不足^⑫。如果农村居民与城镇居民拥有相似的促进生产所需要的基础设施条件、拥有不因收入水平差距而产生差别的教育机会、拥有不因抵押能力差别而产生差别的信贷机会,那么缩小城乡居民的收入和消费差距才能有更坚实的基础。

(二)农民增收的有利因素出现弱化

1.外出务工收入受到较大冲击。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不少外出务工的农民失去工作岗位,外出务工收入受到较大冲击。短期内沿海大批依赖国外市场的中小企业发展艰难的局面难以有效缓解,拉动农民工再就业的步伐会比较缓慢,将较大制约农民工资性收入的增长速度。

2.农产品出口环境恶化。国际金融危机导致国际市场主要农产品需求萎缩,国际贸易保护主义重新抬头,国际农产品市场更加不稳定,从而影响了我国农产品出口进而影响国内农产品价格水平和农民的农业生产收入。东部沿海农产品出口大省的农民收入受到的冲击最为明显。

3.农业生产收益空间受到挤压。各种自然灾害、病虫害频繁发生,导致区域性、季节性的农产品产量下降;食品安全事件屡有发生,多次打击消费者信心导致需求萎缩,这些都严重损害了农民的生产收益能力。农资价格走势也在较大幅度地挤压农业经营的收益空间。在农产品价格稍有上涨或惠农政策出台时,农资价格大幅度上涨;在农产品价格明显下滑时,农资价格变化不大甚至不降反升。有利农民增收的政策或市场变化在很多时候都因农资价格的问题受到大幅侵蚀。尽管当前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涨幅放慢,农业生产成本上升的势头减弱,但金融危机之后,各类生产要素价格很可能继续恢复前两年的上涨势头,农业生产效益下滑的可能性明显存在。

(三)社会保障和人口结构间接制约农村消费

在对全国13个省(市)偶遇调查所得农户样本中,除了51%的农民表示不敢消费的原因是家庭收入太低之外,各有20%的农户认为原因在于收入不稳定和看病、养老等没有保障。保障不到位和人口老龄化在一定程度上对农村消费的扩大构成不利影响。

1.社会保障不健全增加农民生存风险、约束消费倾向。虽然我国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初步形成,但依然存在诸多不足。主要表现为:(1)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还需进一步完善。农民门诊可报销比例不高,大病医疗仍未得到解决,有效保障程度低,未能解决根本问题。(2)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仍处于试点推广阶段。参加养老保险资金负担较重,受益农民的覆盖面很低,2010年也仅在10%的县试点。绝大多数农民仍处于传统的养老模式下。而受约束于独生子女政策,养老寄托于子女身上的风险越来越大。此外,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偏低、城乡低保标准差距较大,农村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水平偏低,失地农民和孤寡老人的社会救助尚不完善。在这种背景下,农村传统的“量入为出”、“节约第一”等消费习惯不得不延续。即便在比较发达的地区,这种情况也很普遍。

2.农村人口老龄化进一步制约消费倾向。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不断发展,我国农村人口结构发生重大变化,对农村居民消费倾向产生较大影响。2000年的人口普查结果显示,我国农村人口老龄化水平已经超过了城镇(6.3%),达到7.4%。

2005年我国农村60岁以上的老人约有8640万人(全国1.44亿人),占农村总人口的12.0%^⑧。老龄人口比重的不断增加是无法改变的趋势,而且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日渐严峻。“十二五”期间农村老龄化问题将更加突出。在农村人口日益老龄化的情况下,年轻人口负担日益加重。为了赡养老人也为了以后自己的养老,储蓄意向将增强,加之农村养老体系尚不健全,老龄人口生活保障的不确定,都将制约农村居民消费能力和消费倾向的提高。

四、“十二五”时期增加农民收入与扩大农村消费的思路设计

“十一五”期间,若干旨在增加农民收入或扩大农村消费的举措取得明显成效,也存在若干不足有待进一步改进。“十二五”时期,国际经济危机的影响还可能持续,中央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增长的方针还将坚持,扩大农村消费依然是拉动内需的政策选择。同时,制约农民增收和扩大农村消费的主要因素也会继续存在,甚至不排除个别因素凸显的可能。

(一)政策评价

1.减负与增收政策效果显著。一些业已执行的农民增收相关政策,在很大程度上为扩大农村居民消费发挥了重要作用。免除农业税、实施农业补贴等生产支持政策,近年来中央还不断加大对农业基础设施和服务的投入力度,力促农业生产条件改善。这些惠农政策极大促进农民增收,并在客观上起到了拉动农村消费的积极效果。免税和补贴首先直接增加了农民的实际可支配收入,而这种增加尤其有利于农民中的低收入群体,从而改变了收入分配格局,提高了宏观层面的平均消费倾向;其次提高了农业生产的积极性,从而也有利于提高农民(尤其是中低收入农民)收入水平,最终产生了和前者相同的效果。所以,在一系列惠农政策的作用下,2005年农村居民消费率从2004年的0.744增加到0.785,增长了4.1个百分点,从而超过了城镇居民消费率(2005年0.757),至今还维持着高于城市居民的消费倾向。

2.农村消费政策初见成效。近年来我国也出台了多项扩大农村消费的政策,并采取措施进一步改善农村消费环境,引导和鼓励农民消费,主要包括:“万村千乡市场工程”、“家电下乡”和“汽车摩托车下乡”等。“家电下乡”、“汽车、摩托车下乡”等应对

危机的消费政策立竿见影,对扩大家电产品和汽车在农村的销售有明显的拉动作用,农村消费总额明显提高^⑨,有效缓解部分企业发展困境。这类政策的本质是通过补贴把农民对这类产品的未来消费需求提前化,有利于优化当前的农村消费结构。但其拉动效果可能是局部、短暂的,会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步减弱^⑩。

3.农村社会保障等相关配套制度逐步建立。2008年开始,全面建立和完善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全面实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提高财政补助标准;进一步提高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水平;试行新型农村养老保险(新农保)等。这些政策为进一步扩大农村消费提供了有力支撑。

4.进一步完善农村消费政策需注意的问题。(1)制定消费政策需提高针对性。目前的农村消费政策,除了要重点解决好操作技术层面的问题^⑪外,最主要的是要解决政策设计和农民最迫切的需要相脱节的问题。不少农民认为“家电下乡”政策可有可无,用处并不大,他们更加关注农村教育、医疗卫生、养老保险等公共服务的提供。此外,东、中、西部地区由于发展水平不同,消费环境差异较大,农民消费需求对象各异,而目前的消费鼓励政策的针对性不强,造成部分消费资源的浪费和消费政策的失效。(2)消费环境改善需加强力度。政府制定和执行的“万村千乡市场工程”具有较宽阔的战略视野,但是相比农村消费大环境改善的需要,还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尚难较大幅度激发农民消费热情。从全国样本数据来看,大多数乡村消费市场环境不容乐观,伪劣产品多、产品质量差等问题突出。在219个有效样本中,只有8.2%的农民觉得农村消费环境不错,绝大多数农民认为目前农村的消费环境太差。反映比较集中的问题包括假冒伪劣产品多(占39.7%)、产品质量不好(占30.1%)、售后服务跟不上(占10.0%)。商品短缺已不是农村市场的主要问题,但由于市场开放程度快速提高而监管长期缺位造成的问题日益突出。

(二)“十二五”时期农民增收与农村消费的环境判断

1.农民收入增加将面临前紧后松的大环境。“十二五”时期实现农民收入较大幅度增长,可能更多地受到国内外经济环境变化的影响。这种影响在此期间可能出现前紧后松的趋势,农民收入增长也

将相应呈现前稳后高的态势,其中,转移性收入将沿袭“十一五”期间快速增长的格局,其增长速度可能超过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速度,农民的农业收入将继续保持增长态势,但增长速度的波动性将会明显增加。理由是:(1)前期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依然存在,但力度会逐步减弱。随着经济危机影响的减弱和世界经济形势的逐步好转,整个国际市场需求将会出现变化,包括粮食在内的主要农产品价格会进入一个活跃期,从而拉动国内农产品价格上涨,这将有利于农民增加农业生产性收入。(2)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世界经济的复苏过程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依靠外需扩张拉动国内经济迅速增长的难度和风险明显加大,国际金融危机对国内中小企业发展的影响,短期内也难以有效缓解,企业发展复苏的任务艰巨,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会继续受到影响。但是,后期的世界经济发展可能会逐步走入稳定正常的轨道,国内主要依靠出口的劳动密集型企业恢复开工并逐步扩大生产规模,将会带来农民工工资性收入的增加。(3)尽管当前国内农业生产资料价格受需求影响涨幅放慢,成本上升的势头在减弱,但“十二五”期间,随着各项刺激经济发展政策效力的进一步发挥,各类生产要素价格很可能恢复到前几年的上涨势头,农业生产效益下滑的可能性明显存在,易导致农民农业收入出现较大波动。同时,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加快推进,农业发展的要素成本和机会成本加快提高,农业发展对现代生产要素的依赖也在逐步增强,这些现代生产要素对应的成本大多具有能源价格主导型特征,国内外能源价格的波动和国内外农资市场的垄断,都可能放大农业经营效益和比较利益的波动,进而通过影响农产品供给,加剧农产品价格的波动。(4)粮食等主要农产品供给安全问题的长期存在及其局部严重化,容易导致农业结构调整的反复并妨碍农业增收渠道的拓展。

2.外部环境变化将为农村消费带来变化。(1)“十二五”时期,将是继续推进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重要阶段,在这一阶段中,更多的农民脱离农村进入城镇,在增加城镇消费的同时,也将引起农村消费总量的变化。(2)工业化、城镇化带来农民更多的非农业收入,这部分收入中将会有很大一部分转化为农村的消费支出,转化为增强农民消费能力的一部分,虽然农村消费总量减少是一个趋势,但人

均消费水平将会明显提高,实现农村消费结构升级将有更坚实的基础。(3)道路、水、电、通讯等农村基础设施将会得到进一步改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农村新型养老保险等公共服务供给都会得到完善和强化,这将会为农村消费的持续扩张创造更有利的条件。

(三)思路框架

综合以上分析,我们认为,“十二五”时期增加农民收入与扩大农村消费的总体思路框架可从以下方面展开。

1.“十二五”期间增加农民收入与扩大农村消费的着眼点,在于实现全面小康和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从国家发展战略的角度,较快增加农民收入、扩大农村消费是经济健康发展的需要。健康的经济发展需要合理的收入分配格局和合理的消费、投资结构,目前收入分配结构不合理以及投资消费结构失调的突出问题需要通过更快增加农村居民收入、提高农村居民消费比重来改变。从全面小康的发展目标来看,更快地改变农村居民收入偏低、消费占比偏低、消费质量偏低的局面是“十二五”期间必需着力推进的战略任务(见图5)。

2.扩大农村消费的根本,在于较快提高农民收入、持续增强其消费能力。农村消费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率之所以不高,是因为农村居民在国民经济增长过程中所占分配份额太低。扩大农村消费,核心问题在于增强农村居民消费能力,增强消费能力,根本又在于提高农民收入水平。

3.促进农民增收、扩大农村消费应重点关注中西部地区和中低收入人群。尤其要从提高宏观层

面的平均消费率考虑,重点解决相对落后农村地区、西部农村地区、农村地区的中低收入人群消费能力更快地提高,特别是要在“十二五”期间倾力解决制约其消费能力扩张的瓶颈问题。

4.解决人力资本、金融和基础设施三大问题是突破农民增收和消费瓶颈的关键。制约落后地区农村居民较快发展的主要问题在发展的起点,包括:因教育费用和质量产生的人力资本投资不足、因金融制度缺陷导致的物质资本积累能力不足、因公共财政配置方式导致的生产基础设施严重滞后等。

5.有限的财力要求实施有差别的支持方案。什么样的支出方案更有利于促进经济持续发展并促进全面小康的实现,这是我们的财政支出计划需要慎重考虑的问题。在财力有限的情况下,公共投资撒胡椒面或嫌贫爱富的模式都是相对低效的。针对弱势群体、落后地区的投入更有利于社会整体进步。全部由私人支付的纯粹市场化方案是最差方案,即便不考虑政治、社会稳定等因素,对经济的持续增长也最为不利。在人力资本投资、医疗、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等准公共物品、公共物品的供给上都符合这种逻辑。

6.农村基础建设投资和公共物品供给的改善,可以从根本上促进农村消费。在实现全面小康的大目标下,强化对农村各类基础建设、公共物品供给的投入是破除农民增收和农村消费扩张障碍的重要手段。而且这种投资在短期内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效应,可能并不亚于高速公路、城市房地产建设,同样达到扩大内需促进增长的目的,还有利于推动新农村建设和全面小康战略的实现,有一箭多雕之效。

据此,“十二五”期间增加农民收入与扩大农村消费的总体思路概括为:按照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保持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要求,把实现农村居民收入较大幅度增长作为进一步增强农民消费能力的根本着力点,实施教育、金融和基础设施三大差别化支持方案,重点提升中西部落后地区、中低收入群体收入能力和消费能力;推动农民收入倍增计划,构建有利于农民的农业产业链模式,营造有利于现代农业和中小微型企业发展的环境;促进农村居民生活现代化,加快发展农村社会事业,改善农村消费环境。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突出重点,进一步完善农民增收和农村消费政策,构建农民收入较快增长、农村消费持续扩张的长效机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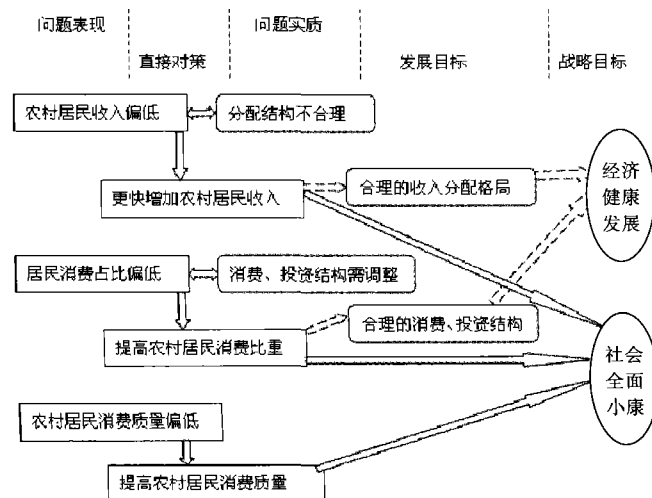


图5 增加农民收入和扩大农村消费与社会发展战略的关系示意

为农村经济社会的全面进步奠定坚实基础。

五、“十二五”期间增加农民收入与扩大农村消费的对策建议

根据上述思路,“十二五”时期增加农民收入与扩大农村消费,需着眼全局,通盘考虑,采取综合措施,着力夯实农民收入基础,增强消费能力、提升消费品质、降低消费成本。

(一)实施三大差别化支持方案

1.实施有收入差别的教育支持方案,率先延长落后地区农村义务教育年限。目标:让每一个具有升学天分的农村孩子都能不受经济条件的约束顺利地获取接受高中(职高)以上教育的机会。

(1)实施师校分离、教师轮岗。将义务教育阶段的教师纳入公务员序列管理,教师与学校脱钩,通过县域范围内的教师轮岗制度安排,尽快改变城乡教育资源配置严重不均的分配格局;教师待遇、教师编制和教育建设经费投入向农村学校、薄弱学校倾斜。(2)延长义务教育年限农村优先。统筹全国义务教育发展进程,在对中等职业教育阶段农村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实行免费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范围,率先将农村(尤其是中西部落后地区的农村)高中教育和职业教育纳入义务教育的范围^⑥。(3)加大农村幼儿教育投入。将农村幼儿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加大培训师资,改善农村幼儿园办学条件,控制入园收费标准。

2.实施有城乡差别的金融支持方案,坚决实现利于农村发展的金融体系改革。目标:让每一个在村里拥有良好信用记录的人都能获得促进其生产发展的贷款。

(1)制定宽口径的涉农金融支持体系。对所有提供涉农贷款的金融机构提供政策优惠,鼓励各类金融主体有创造性地开展支农金融服务;明确要求国有商业银行承担与国有性质相称的支农义务并以此为考核指标之一,赋予农村信用社、邮政储蓄更大的信贷裁量权。(2)简化小额农贷期限、结息及五级分类清分标准。根据农民收入和借贷行为特征,建立来自村庄内部的信用评价体系。农贷按生产周期结息,只要在一个生产周期之后结清利息的贷款,五级分类可将其归并在正常类;小额农贷不设定到期日期,只设定授信额度,并只要求其在年终前结清利息,在贷款期间农户随时都可以还清或

再借出授信内的贷款,授信额度因联保还款情况而调整。(3)适当放宽支农贷款条件,建立合宜的担保机制。根据农民的收入和借贷行为特征,制定简便实用的信贷评价制度,探索农民宅基地和住宅抵押、权益质押等担保形式,提高农民对金融信贷的可获得性。引导农民强化个人信用,增强风险意识。同时,对农户贷款进行有限贴息支持,实行无利率差别的贷款模式^⑦;通过设立村庄本土兼职信贷员、农村金融中介(如资金互助社)等方式降低金融机构对农户贷款的交易成本。

3.实施有地区差别的财政支持方案,强力推进落后地区农村道路、水利基本建设。目标:让每一个村庄都能不受自身配套能力的约束获得其生产经营活动所需的基本设施。

(1)加大投入,各有侧重。在确保2010年底基本实现“十一五”基础设施建设目标的基础上,“十二五”时期要继续加大中央财政对农村公路、农田水利特别是中西部落后地区相应的投资力度。欠发达地区应该集中资金解决基本道路建设问题,力争尽快实现道路长年顺畅通车的目标;中等发展水平的地区(包括粮食主产区),应该着力进行农田水利设施建设,并尽可能将道路的硬化延伸至自然村,形成高效的路网。(2)完善中央投资地方配套政策。对国定贫困县以及粮食主产区中经济水平相对落后的县市,尽快取消配套或大幅度降低配套比例;在中西部地区,可灵活采用以劳抵资,或实物支持、自行建设等方式,或集中部分专项财政资金的增量、“每年解决一件大事”,群策群力地推进这些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的跨越式发展。

(二)推动农民收入倍增计划,从根本上增强农民消费能力

从提高农业经营收入、非农经营收入、务工收入、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全面着手,多管齐下,推进农村居民收入倍增。

1.打造以农民为主体、具有强大竞争力的现代农业产业链体系。(1)推进农业组织创新,加快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和农产品行业协会等,强化农民在农业产业化过程中的谈判能力和对“企业控制产业”的制衡机制。(2)以农业专业合作社、集体经济组织为主要载体,从良种培育、生产服务、营销和物流体系建设等方面入手,打造现代农业产业链,把产业链增值的好处最大限度地留在农业生产者手

中。(3)通过技术进步,促进农业发展加快走上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轨道,努力降低农产品生产成本,尽量降低对石油类农资产品的过度依赖。(4)推进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建设和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协调推进粮食等主要农产品综合生产能力和综合流通能力建设,稳定增加农产品有效供给,健全推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长效机制。(5)立足特色、有机、健康农产品的生产基础,探索适合中西部边远山区的农业现代化发展模式,促进落后地区农业的跨越式发展。(6)综合考虑个体经济效益与社会整体效益,因地制宜发展农业,充分尊重经营主体的自主性和创造性。注重开发农业的多种功能,向农业的广度和深度进军,促进农业结构不断优化升级,最大限度地拓展农业的盈利空间。(7)力争实现3年内健全乡镇或区域性农业技术推广、动植物疫病防控、农产品质量监管等公共服务机构的目标,并力争实现村级服务站点全覆盖。

2.为农民从事非农产业创造条件。第一,大力促进农村生产、生活服务业的发展,拓展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和创业的空间。第二,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通过促进中小微型企业、民营经济的发展,努力形成大、中、小企业之间,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之间优势互补的格局,创造利于农村劳动力就业的产业发展结构。

3.加快构建长期的生产补贴、价格支持与公共基础投入相互补充相互配合的灵活支持体系。在财力允许的情况下,有条不紊地加大农业生产支持力度,让农民更多地获取农业生产外部性补偿,提高转移性收入水平;建立起较有效的价格调节机制,保证农民稳定的农业生产经营收益。

4.通过合理的机制让农民更多享有城镇化带来的土地增值等财产性收入。按照中央政策安排,加快推进农村土地管理制度改革,改革征地制度,完善征地补偿机制,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切实让农民合理享有农村土地增值带来的增值收益。

5.大力推进农民培训。继续完善现有农民培训方案,力争在“十二五”期间让农民培训成为常态,而不仅出于应对危机的考虑。同时,除了为非农就业准备的培训之外,还要进一步探讨对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常规技术培训,以及适应互联网时代所需要的基础知识和技能培训,全力提升农村人力资本水平。

6.营造有利于现代农业和小型、微型企业发展县域经济环境。转变县级政府考核机制和财税分配体制,为全力推进符合中国国情的农业现代化提供坚强有力的组织保障和物质保障。让县级政府从GDP考核的桎梏中解脱出来,改变基层亲大项目疏小企业、亲招商疏创业、亲资本疏农业的局面,为因地制宜地发展适合各地特征的现代农业提供良好的基层治理环境。

(三)实施农村居民生活现代化促进工程

推进农村合作医疗、农村养老保险等基本保障,以增强农村居民消费信心;推进农村生活、消费基础设施建设,以优化消费结构、提高生活质量,促进农村居民生活现代化。

1.改进新农合、推进新农保。简化新农合报销手续,实现在医院交费、报销一步到位,扩大报销药品目录,将门诊纳入报销范围。逐年增加财政补助标准,提高报销上限,并在坚持大病统筹为主的基础上,扩大特殊门诊病种保障范围,逐步向城市居民的水平靠近。加快推进新型农村养老保险试点进程。建立社会养老和家庭养老有机结合的养老保障模式,量力而行、循序渐进,争取在“十二五”末期基本实现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全覆盖,并根据国家财力增长情况,逐步提高保障标准和水平。同时,进一步完善农村最低生活保障补助制度,根据农村生活成本变化情况,逐步提高农村低保标准。

2.大力解决农村居民水、电、网问题。(1)因地制宜创造性地解决居民生活用水。有效结合大区域统一供水和小局部(如以村为单位)集中供水多种形式,加强以村为单位的自来水管网建设和维护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2)实行农村电网二次升级改造。按照适度超前的原则增加农村电网负荷,稳定电压,同时降低农村生产生活用电的价格,实现与工业、城市“同电同网同价”,降低农民使用家用电器的用电成本。(3)加快推进农村信息化。结合3G技术的推广应用,下大力气建设农村信息化基础设施;开发适合农村特点的实用价廉、操作方便的计算机,实施“电脑入户”工程,缩小城乡信息化鸿沟。

3.提升农村消费环境。(1)加快构建现代农村商品流通体系。一是继续推进“万村千乡市场工程”和供销社“新网工程”,特别要发挥好供销社的作用,加强农村市场体系建设,用现代流通方式改造农村传统商品流通模式,提高商品流通效率。二是

鼓励有能力和具备条件的企业在农村发展连锁经营,建立覆盖面较广的服务网点,开展采购、配送、销售、租赁和技术推广等多样化服务,引导大型流通企业和供销社按照双向流通模式,将工业品下乡和农产品进城结合起来。三是引导和支持流通企业与生产企业合作建立区域性农村商品采购联盟。通过大批量联合采购、集中下单,降低进货成本,同时引导工业企业开发生产适合农村消费特点的产品,使农民能买到“物美、价廉、实用”的产品。四是探索将易货贸易与现代流通模式结合的方式,缩短流通时间,简化货币关系,解决落后地区农民资金短缺的困境,提高其消费能力。(2)加强农村市场治理。坚决打击在农村市场销售假冒伪劣商品的行为,确保农村消费安全放心购买和使用。严禁入围“家电下乡”、“汽车、摩托车下乡”政策的企业,在农村市场搭售库存积压或不合格产品,损害农村消费者利益。坚决制止农村市场不合理定价问题,特别是对电、固定电话、移动通信等垄断行业商品或服务的定价进行必要的行政干预和监督,降低农村消费成本。

(四)完善消费政策

1.实行差异化的消费政策。在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中高收入农民群体大,消费支付能力强,处于消费升级阶段,支撑农民消费的软、硬件配套设施也相对较好,是扩大农村消费的主要力量。对这个地区的消费政策应侧重于鼓励教育、文化、旅游、休闲娱乐、医疗保健、信息咨询等方面的消费,充实消费内容,拓宽消费渠道,扩大服务性消费,培育新的消费热点,加快消费升级,增强东部地区对农村消费的拉动力。中、西部地区对农业生产性消费^⑨需要较高,消费政策应从应支持生活性消费进一步向生产消费延伸,特别是增加动植物疫病防治、农业技术咨询、农机具作业和维修、市场信息等方面服务。

2.进一步完善“家电下乡”、“汽车、摩托车下乡”等消费补贴政策。一是根据农民的实际需求,放宽下乡产品类型、规格、价格限制,拓宽产品范围,满足不同人群的消费需求;二是按照简便、高效的原则,加快补贴进度,简化补贴手续和流程,授权销售网点代办申领并垫付补贴的方式,做到现场购买现场兑付;三是加强对教育程度不高和偏远地区农民的宣传力度,保证文化素质低、交通不便的农民也能够便捷地享受补贴好处;四是赋予地方政府部门一定的

自主权,使其能够根据当地实际情况选择普遍受当地农民欢迎的产品进行补贴。但可以预见,这类政策的拉动效果会逐渐减弱。为保持延续性,可自然过渡到“以旧换新”政策,更好地推动农村消费升级,既增加农村居民福利,也可促进资源循环利用。

3.继续推进新农村建设,谋划农村居民建房支持方案。结合新农村建设的需要,强化规划对农村建房的引导和管理,因地制宜推进旧村改造,避免重复建房浪费资源,无谓加重农民负担。探索建立农村住房建设补贴制度,结合农村危房改造、旧村改造和新农村建设,对农民建房提供适当财政资金或水泥、建材等实物补贴和金融贴息乃至无息贷款,发挥金融杠杆效应,缓解农民建房筹资难问题,缩短筹资时间。通过支持农村住房建设,带动相关产品需求和后续消费。

(作者单位: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产业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责任编辑:程淑兰)

注释

①本研究所指“农民”是广义的概念,指农村居民,以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村居民为主体,也包括外出务工或从事其他非农业经营活动但家庭生活在农村的居民。该群体的主要特点是作为生产和生活的复合体,结合了生产者和消费者的特征。部分完全不从事农业生产,仅以外出务工或其他非农收入为唯一收入来源的农村家庭,出于统计和研究的方便,也在我们考察的范围内。

②“农村消费”也是一个泛化的概念,与“农民”的概念相协调,主要指农村居民的消费。从统计数据上,直接以国家统计局使用的农村居民消费相关指标为参照。

③遵循严格的经济理论传统,这里的消费仅指“购买劳务和商品用于现在的享受”;而“购买劳务和商品用于生产财富,希望以此财富取得未来的享受”定义为投资(即马歇尔所说的“储蓄”,马歇尔:《国内价值的纯粹理论》。转引自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2005年第16页)。统计口径中的“生产消费”和教育属于投资的范畴。

④因为现行土地产权制度下,土地作为固定资产的许多经济和市场功能无法发挥,土地既无法成为农民的真正财富,又无法作为扩大再生产所需银行贷款的抵押品。

⑤黄祖辉、王敏、宋瑜(2005)从村庄微观角度对农村居民收入差距的解释很好地印证了这一点。他们发现,人力资本的分布差异对村庄内部收入差距起到了决定性作用,是促使村庄内部收入差距扩大的主要因素。

⑥对此不再展开。

⑦刘文斌,2000;杨天宇,2001;朱国林等,2002;臧旭恒、张继海,2005则从居民消费的角度说明了这个问题。

⑧有人厌恶风险,有人偏好风险,有人风险中性。根据正态分布的规律,宏观的加总结果往往就是风险中性的。

⑨涉及其中某些方面的包括:范建平、向书坚,1999;朱信凯,2005;黄少安、孙涛,2005;社科院课题组,1999b。

⑩不能简单地把计量分析的结果轻率地作为研究的结论。

⑪不同的效用体系下,0.6的消费率对某个家庭可能太低,

对另一个家庭可能就太高。这种评判视角就好像用一个城市白领的眼光来评价村里的农民大哥是不是应该少干点农活多参加一些体育活动来锻炼身体一样,非但无助于引导政策,也无益于厘清问题的真相。

⑫转引自杨天宇,2009。

⑬模型有4个假设:第一,中国农村居民是前瞻性的理性消费者,追求生命周期的效用最大化;第二,决策期只有现在和未来两个时期;第三,消费者既是消费决策的主体,也是生产、投资决策的主体;第四,财产存量与现金收入无差异。同时,对新模型变量调整如下:首先,在分析的适当环节引入可变的价格体系;其次,将教育纳入投资的范围,而不是当成一种消费;第三,不把边际效用递减作为纯粹的规律,根据不同消费类型予以区别,把医疗支出与其他消费支出分开;第四,支出只分为消费和投资两部分。因篇幅所限,详细推导过程略去。

⑭所以,一般来说,在收入较低的农村家庭,孩子学习成绩越好,家里越节俭;生产经营技术越好,越愿意在生产上进行更多投资,从而也越节俭。

⑮但对于消费还是投资、当前消费还是未来消费的决策,并不会直接的作用。

⑯与1980年相比增长470.6%,年均增长6.4%。

⑰与1980年相比增长了383.5%,年均增长5.8%。

⑱恩格尔系数(%)=食品支出总额/消费支出总额 \times 100%。消费支出总额使用中国统计年鉴中“生活消费总支出”指标。

⑲2008年底,全国农村居民家庭每百户拥有彩色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分别为99.2台、30.2台和49.1台,而2002年分别为60.5台、14.8台和31.8台;每百户农村居民拥有移动电话、电脑和家用汽车分别为96.1部、5.4台和1.2辆,而2002年移动电话和电脑分别为13.7部和1.1台,家用汽车几乎为零。

⑳平均消费倾向=平均消费率;边际消费倾向=消费增加量/收入增加量

㉑从时间上大体可以推断,这应该是全面免除农业税等惠农政策产生的消费激发效应。

㉒1978年以来的情况详见附图1。

㉓根据《中国统计摘要2009》中支出法国内生产总值主要构成项之最终消费之居民消费支出计算。

㉔根据统计数据对比,2008年我国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为43.7%,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值与之相接近的年份为1998年(44.7%),即现在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相当于1998年时城镇居民的消费水平。

㉕本课题涉及的调研包括:第一,课题组的核心调研。2009年6月到8月,调研了福建省晋江市、云霄县,黑龙江省青冈县和甘肃省礼县,对象为当地各级政府部门、村干部和农户,形式包括座谈、个别访谈和问卷调查。调研的三省四县涵盖东南沿海地区、东北粮食主产区 and 西北山区,代表了高、中、低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涉及农民创业、特色种养、粮食生产和外出务工几种不同增收模式,反映的问题具有一定代表性;第二,辅助调研。组织中国人民大学学生利用暑期返乡的机会进行农户问卷调查,调研时间2009年7月到8月,调查共涉及全国13个省(市),共收回问卷234份,其中有效样本231份;第三,两次前期调研。3月参加国家发展改革委专题调研组赴安徽蚌埠怀远县、马鞍山当涂县,江苏南京江宁区、溧阳县两省四县(区)的调研,调研以与各级政府成员、农户的座谈为主;4月参加国家发展改革委青年干部农村消费专题调研,地点包括江西省丰城市、吉安县和永新县三县市,调研结合座谈和农户问卷调查,问卷调查获得农户样本246个。

㉖即影响消费能力增长。

㉗主要体现在对消费倾向的影响。

㉘如课题组调查所涉及的福建省晋江市、江苏南京江宁区等。

㉙如福建省云霄县、黑龙江省青冈县、安徽省当涂县和江西省吉安县、永新县等。

㉚如甘肃省礼县、安徽省怀远县等。

㉛据农业部调查,我国农民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占32.8%,初中文化程度占49.4%(根据温思美2009年3月在全国政协会议上的发言数据整理,结合上下文估计应为2007年数据)。

㉜在甘肃省礼县,高中文化程度以上的农民仅占8.8%,文盲半文盲占到了22.8%。当地劳务输出集中在家政、建筑等体力型行业,收入水平不高。

㉝例如,福建省云霄县农业从业人员中40岁以上的约占80%,小学以下文化程度约占60%。

㉞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农村小学并校后,距离较远的学生不得不在校寄宿,增加了食宿开支。二是“两免一补”政策,尽管减少了农村子女义务教育阶段的正常支出,但也造成了众多农村中小学校经费不足,优质师资流失,教育质量下滑的问题,许多家庭只好异地就学,增加了选校费等额外负担。

㉟农村居民家庭的教育借款主要来源于自己的亲戚,占到82.6%;向朋友和银行借款的家庭占少数。

㊱在消费方面,教育支出不仅大量占用了农村居民家庭的可支配收入,直接削弱了农民的消费能力,而且为应对孩子升学带来的更高的教育费用增长,不少家庭只能省吃俭用,进行预防性储蓄,这也减少了农村居民家庭即期消费的可能。

㊲农村道路问题同样突出,下面将另外展开。在对江西三县市的调研中,对于什么是比较突出急需解决的问题,44.4%的农户选择了村里的道路,29.3%的农户选择了农田水利。两项的频次累计占74%。其他许多选项累计频次仅占26%。

㊳中国农村饮水安全网(www.ncys.org.cn)。

㊴全国乡镇34170个(2009年数),截至2009年6月底,2945个乡镇设有金融机构,8000多个乡镇仅有一个银行网点。

㊵云霄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反映由于“新农合、住房公积金、社保等资金不得存入农村信用社”等歧视性政策的出台,使得相当一部分涉农资金存入其他金融机构,导致本地资金通过其他渠道流向外地,无法充分运用本地资金为本地农民服务。

㊶欠息90日以上。

㊷广义的生产经营三要素可扩展为人为资本、物质资本和生产基础设施3个方面。人为资本表现为劳动者的经营能力、发展机会;物质资本主要体现为生产资料的获取能力,该能力与资金可得性密切相关;生产基础设施包含了土地的实际生产能力、要素和产品与市场连接的状况等。相应地,在实际生活中,这3个方面分别体现为教育、金融和生产基础设施。

㊸根据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的《中国老龄事业的发展》报告中的数字。

㊹2009年前4个月,农村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3万亿元,同比增长16.9%,比城市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高2.8个百分点,增幅首次超过城市。

㊺这种减弱的趋势在云霄县提供的数据中就已经初步显现。根据该县家电下乡产品销售统计,2009年2月~5月的月销售量分别为20台、89台、403台和204台。销售高峰在4月份,5月已出现明显下降。5月的销售额也从4月的76万元降到44万元。

㊻如在调研报告多次提到的补贴手续繁琐、补贴额度低、

品种型号少等问题。当然,有些问题已经得到逐步解决,如大幅度提高限额标准、增加品种等。

⑮避免城市优先、局部统筹的做法,否则将导致差距进一步拉大。

⑯政府通过贴息,使金融机构获得高于其他类贷款的利息回报,使农户的贷款利息不高于其他个人或企业的利息水平。但是,涉农贷款的利息水平不能因贴息而低于其他贷款,防止其他人群搭便车使涉农贷款没法落到真正需要的弱势群体。

⑰为了与当前的表达习惯一致,这里指统计口径的生产性消费,即理论所指的生产投资。

参考文献

- (1) Brandt, Loren, Dwayne Benjamin, Paul Glewwe, Guo Li., 2000, "Markets, Human Capital and Income Inequality in Rural China", University of Toronto Law and Economics Research Paper No.01-06.
- (2) Friedman, Milton, 1957, "A Theory of the Consumption Function",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Inc.
- (3) 蔡昉、王德文:《经济增长成分变化与农民收入源泉》,《管理世界》,2005年第5期。
- (4) 陈锡文:《农民增收需打破制度障碍》,《经济前沿》,2002年第11期。
- (5) 杜海韬、邓翔:《流动性约束与不确定性状态下的预防性储蓄研究》,《经济学(季刊)》,2005年第1期。
- (6) 樊潇彦、袁志刚、万广华:《收入风险对居民耐用消费品消费的影响》,《经济研究》,2007年第4期。
- (7) 范建平、向书坚:《我国城乡人口二元社会结构对居民消费率的影响》,《管理世界》,1999年第5期。
- (8) 高梦滔、毕岚岚、师慧丽:《持久收入与农户储蓄:基于八省微观面板数据的经验研究》,《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8年第4期。
- (9) 杭斌:《流动性约束、不确定性与消费过度敏感》,《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1年第12期。
- (10) 胡雪萍:《优化农村消费环境与扩大农民消费需求》,《农业经济问题》,2003年第7期。
- (11) 黄季焜:《对农民收入增长问题的一些思考》,《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0年第1期。
- (12) 黄少安、孙涛:《非正规制度、消费模式和代际交叠模型》,《经济研究》,2005年第4期。
- (13) 黄少安:《制约农民致富的制度分析》,《学术月刊》,2003年6月。
- (14) 黄祖辉、王敏、宋瑜:《农村居民收入差距问题研究——基于村庄微观角度的一个分析框架》,《管理世界》,2005年第3期。
- (15) 黄祖辉、王敏:《农民收入问题:基于结构和制度层面的探讨》,《中国人口科学》,2002年第4期。
- (16) 凯恩斯(1936):《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宋韵声译,华夏出版社,2005年。
- (17) 柯炳生:《关于我国农民收入问题的若干思考》,《农业经济问题》,2005年第1期。
- (18) 林毅夫:《“三农”问题与我国农村的未来发展》,《农业经济问题》,2003年第1期。
- (19) 刘建国:《我国农户消费倾向偏低的原因分析》,《经济研究》,1999年第3期。
- (20) 刘金全、邵欣炜:《流动性约束与消费行为关系的实证研究》,《管理科学学报》,2004年第4期。
- (21) 刘文斌:《收入差距对消费需求的制约》,《经济动态》,2000年第9期。

态》,2000年第9期。

(22) 吕耀、王兆阳:《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及其分配差距的实证分析》,《中国农村经济》,2001年第6期。

(23) 裴春霞、孙世重:《流动性约束条件下的中国居民预防性储蓄行为分析》,《金融研究》,2004年第10期。

(24) 戎刚:《农户消费的实证研究》,《中国农村观察》,1997年第6期。

(25) 社科院课题组(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现阶段我国农民消费行为研究》):《关于开拓农村消费市场的制度性问题分析》,《中国农村观察》,1999年第5期(a)。

(26) 社科院课题组(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现阶段我国农民消费行为研究》):《我国现阶段农民消费行为研究》,《中国农村经济》,1999年第9期(b)。

(27) 孙凤:《预防性储蓄理论与中国居民消费行为》,《南开经济研究》,2001年第1期。

(28) 孙继辉:《增加农民收入的新思路》,《管理世界》,2004年第4期。

(29) 孙江明、钟甫宁:《农村居民收入分配状况及其对消费需求的影响》,《中国农村观察》,2000年第5期。

(30) 孙文凯、白重恩:《我国农民消费行为的影响因素》,《清华大学学报》,2008年第6期。

(31) 万广华、史清华、汤树梅:《转型经济中农户储蓄行为:中国农村的实证研究》,《经济研究》,2003年第5期。

(32) 万广华、张茵、牛建高:《流动性约束、不确定性与中国居民消费》,《经济研究》,2001年第11期。

(33) 汪红驹、张慧莲:《不确定性和流动性约束对我国居民消费行为的影响》,《经济科学》,2002年第6期。

(34) 王芳:《不确定性因素对我国农村居民现金消费支出的影响分析》,《数理统计与管理》,2006年第4期。

(35) 王秀杰:《农民收入对农民消费及国民经济增长的影响分析》,《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学报》,2002年第2期。

(36) 温涛、冉光和、熊德平:《中国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经济研究》,2005年第9期。

(37) 杨天宇:《中国的收入分配与总消费:理论和实证研究》,中国经济出版社,2009年。

(38) 杨天宇:《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影响需求的实证研究》,《消费经济》,2001年第1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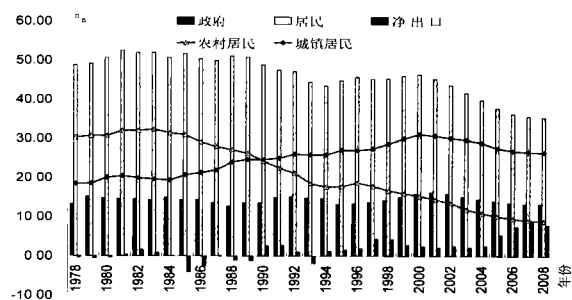
(39) 臧旭恒、裴春霞:《转轨时期中国城乡居民消费行为比较研究》,《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7年第1期。

(40) 臧旭恒、张继海:《收入分配对中国城镇居民消费需求影响的实证分析》,《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5年第6期。

(41) 朱国林、范建勇、严燕:《中国的消费不振与收入分配:理论和数据》,《经济研究》,2002年第5期。

(41) 朱信凯:《流动性约束、不确定性与中国农户消费行为分析》,《统计研究》,2005年第2期。

附图



附图1 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支出法)各成分构成变化(1978~2008年)

- Theoretical Study on the Underpricing of Initial Public Issues: A Survey.....*Fan Hanxi*
- The Ownership in the Perspective of Risks, and its National Effect: Taking the Insurance Industry as an Example
..... *Zhang Ji*
- A Study on the Control, by Foreign Capital, of China's Industries, and our Countermeasures*Bu Wei*
-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Firm's Actions and Firm's Growth Value *Zhang Baohong and Zhang Baozhu*
- The Evaluation System of the Index of Firms' Commercial Model in the Commercial Ecological System Based on the Theory of the Dynamic Capability.....*Sun Liancai and Wang Zongjun*
- ABSTRACTS**

The Micro Characteristics of China's Banks, and the Examination of the Channels of Bank Lending

Xu Mingdong and Chen Xuebin

The change in monetary policies will not only cause changes in aggregate lending, but also may generate heterogeneous banks' credit supply. We have, in this article, used the dynamic panel method put forward by Arellano and Bond in 1991 to make a case study to examine whether the impact of China's monetary policy on the supply of the bank credit is dependent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banks' balance sheets between 1998 and 2009. The results of our study indicate that (1) the lending behavior of large banks with high liquidity is more apt to be driven by ample capital, while the lending behavior of small- and medium-sized banks is more prone to be driven by liquidity, and that (2)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bank size are an import factor of impacting on the heterogeneous reaction of the bank lending to the monetary policies; the adjustment of the interest rate has more effect on the lending size of large banks, the adjustment of the deposit reserve ratio has more impact on the banks with low liquidity and small- and medium-sized banks, and the operation of the passive open market sterilization has relatively less effect on the curb on the credit expansion of various kinds of banks. The results of our study has provided supportive evidences, for monetary authorities, for analyzing the blocking transmission causes and implementing a differentiated monetary policy.

A Study on the Increase in Peasants' Income and on the Policy for Enlarging Consumption in Villages

Fang Songhai, Wang Weinong and Huang Hanquan

At present, the income of China's rural residents is continuously increasing, the rural aggregate consumption has been raised, the consumption structure has been optimized, and the tendency to consumption has been stronger than that of urban citizens—the four characteristics mentioned above are prominent. However, noticeable are the widening of the gap between cities and countryside, between regions and between people, and the decline of the contribution rate of consumption. The three major factors — the educational expenses, the infrastructure and the constraint of credit—both restrict the increase in peasants' income and curb the expansion of the rural consumption. At the same time, the increase in peasants' income is confronted with environmental changes, and the rural consumption is also confined indirectly with the social security in villages and the population structure. In the period of the 12th plan, the starting point of the increase in farmers' income and the enhancement of the rural consumption should lie in the realization of a comprehensively well-off society and a sustained healthy development of economy. Achieving a greater increase in the income of the rural residents is the basic emphasized point for further improving their ability of consumption. We suggest, therefore, that we should implement the plan to support the three major differentiations in education, finance and infrastructure, that the key point is to boost the ability of increasing income and the ability of consumption of the people with low or medium income in the backward areas in Middle and Western China, that the realization of the plan for increasing the peasants' income should be propelled, that the model conducive to the agricultural industrial chain of peasants should be constructed, that the development environment helpful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modern agriculture and the small- and medium-sized firms should be created, that the modernization in the life of rural residents should be propped up,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rural social affairs should be quickened, and that the environment

of consumption in villages should be improved.

**Product Heterogeneity and Automobile TNCs' Choice of Entry Modes into
Chinese Marke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emand**

Sun Jiangyong and Wang Xinhua

For such TNCs supplying heterogeneous products as those in automobile industry, it is of more value in guiding and applying to study the entry mod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eterogeneous products rather tha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 firm as a whole. This paper firstly sets up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and analyzes profit functions of export and direct investment respectively. Conclusion drawn from the theoretical analysis is that for high grade products, TNCs enter oversea markets through export, while for middle and low grade products, TNCs choose direct investment. The further empirical test based on Chinese automobile market data of 2009 supports the conclusion drawn from theoretical analysis.

**The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the Intervention of Local Governments, the Corporate Governance
and the Change in the Direction in which the Collected Fund Obtained through IPO is Put**

Ma Lianfu and Cao Chunfang

Starting from the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the intervention of local governments, and taking as specimens the A-share listed companies with IPO from 2001 to 2005, we have, in this article, made a case study to examine the effect of the three factors mentioned above on the change in fund raising. By our study, we have discovered that, in the non-state-state-owned companies, the better governance of companies can effectively decrease the probability of the change in fund raising and support the company's strategy, that, in the state-owned companies of local governments, the better governance of companies can only play a role of "fire wall" in the changes that cause losses, and that, in the state-owned company group, only when the burden of local governments is lighter, can the better governance of companies work in the changes that cause losses. Because of the existence of the motive of "the constraint of the inverted soft budget", the stronger intervention of the local governments can lead to the change that causes the losses of the local state-owned enterprises, but the impact of this intervention on other non-state-owned enterprises is confined by the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The developed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can hold down the compensatory changes in the non-state owned enterprises, but it cannot efficiently curb the changes that cause loss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local governments' intervention and that of the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we have, in this paper, divulged a part of the cause for the change in the collected fund obtained through IPO, providing a new viewpoint for correctly recognize the change in fund-raising and for the making of related supervision policies.

Editor in Chief:	Li Kemu
Vice Chief_Editor:	Tian Yuan, He Shaohua, Lu Jian & Jiang Dongsheng
General Editor:	Xie Yue
President:	Gao Yanjing
Sponsor: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re of the State Council,P.R.C.
Add:	No.8 Dazhongsi, Donglou, Beijing, China
Tel:	(010)62112235 62111169

MANAGEMENT WORLD

Original Name: ADMINISTRATIVE WORLD